

從管制走向共好

校園手機管理的自律引導 與制度支持

|| 林香吟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校長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

一、前言

在數位科技全面普及的今日，智慧型手機已深刻改變學生的生活重心與學習型態。手機的高度普及對學習專注力、班級經營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影響日益顯著，也使學校面臨前所未有的教育治理挑戰。

目前多數學校以禁止使用或集中收納為主要管理策略，雖能維持秩序，卻衍生制度僵化、教師負擔加重與學生認同不足等問題。在此情況下，「是否管理手機」已非核心命題。真正的關鍵在於：如何透過制度支持與自律引導，在規範與自主之間建構具有教育意義的治理模式，實現「從管制走向共好」的轉型。

本文以高中實務經驗為基礎，分析手機管理困境，並透過角色案例探討制度、教師與學生的互動，提出由「控制導向」轉向「支持導向」的治理思維。

二、治理困境與轉型原則

手機管理不僅是紀律問題，更涉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與學習習慣之培養。實務現場顯示，學校手機規範面臨以下五大困境：

（一）學校制度僵化與彈性不足

校級規範若過於僵化，無法因應不同班級特質、學科需求與教學情境的差異，致使教師缺乏適切裁量，進



而影響教學彈性與學生學習成效。

（二）執行權責不清與制度授權不足

教師於執行手機保管管理措施時，若缺乏明確法源依據，往往需自行承擔相關責任與風險，易引發家長質疑與爭議，亦降低教師在班級經營上的信心。

（三）學生參與不足與規範認同薄弱

規範制定過程若缺乏學生參與及充分溝通，學生被動接受要求，難以理解其背後的教育意涵，亦不易內化為自律的行為準則，影響規範的穩定性與持續性。

（四）教師執行標準分歧與運作一致性不足

教師對手機管理的執行標準缺乏一致性，甚至同一教師在不同情境下亦有差異，學生投機心理將削弱制度的公平性與正當性，進而影響整體規範的效力。

（五）教師支持不足與實踐動能受限

部分教師面對手機管理所衍生的親師溝通、行政責任及法律風險，容易產生額外負荷感。若缺乏專業支持與制度後盾，將影響其持續投入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的意願與動能。

因此，校園手機治理應由傳統管制思維轉向「原則一致、操作彈性」的制度架構。在校級層面，需建立明確且具支持性的規範準則，以回應制度僵化與權責不清的問題；在班級層面，則透過師生共同參與形成公約，強化學生對規範的理解與認同；在教學層面，應保留教師依情境進行專業判斷的空間，以提升執行的一致性與可行性。此一轉型不僅是制度設計的調整，關鍵在於制度、教師與學生三者之間的互動與協同運作，使手機管理由外在控制逐步轉化為內在自律，進而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與負責任使用科技的素養（Fullan, 2007）。



三、高中實務案例分析

（一）A 教師：從理解出發的「結構化管理」策略

A 教師強調手機管理應建立在學生理解之上。她於學期初引導學生討論使用現況，使其意識到社群媒體對專注力的侵蝕，進而建立管理的正當性。執行上，她採取明確的結構化管理：學生到校後即將手機置於固定位置，課堂間全面禁止，僅於午餐時間有限度使用。她與幹部透過不斷提醒，協助學生度過「戒斷期」，並以「暫時保管」作為違規處理方式。

（二）B 教師：以班級公約為核心的「共識型管理」

B 教師主張回歸班級經營本質，於學期初透過與學生「共同約定手機使用」建立班級公約。當規範源於參與而非指令，學生的遵行度顯著提高。她認為，成功的關鍵在於「信任關係」。當學生感受到尊重並理解目的，便較易轉化為自律行為。此外，班級公約亦具備「保護教師」的功能，經全班確認的規範能大幅降低執

行時的爭議與衝突風險。

（三）C 主任：制度風險與校級治理的觀點

C 主任從行政層面指出，高中缺少全國一致的手機管理規範。若校規未明確賦權，教師的管理作為將承受來自學生與家長質疑的壓力，甚至可能面臨法律風險。因此，手機管理不應由教師個別承擔，而應透過校級制度加以支持。他主張班級公約應與校規銜接，當兩者形成一致性，教師執行將更具正當性與穩定性，進而降低管理過程中的風險。

綜上可知，A 教師提供規範支持，B 教師建立關係支持，C 主任強化制度支持——三者分別對應學生自律形成的關鍵要素，展現手機治理由外在管理邁向內在自律的轉化歷程。校園手機治理可由教師、班級與制度三層面整合，形塑由「制度支持」走向「自律引導」的治理架構，作為實現「從管制走向共好」的基礎。此一治理架構呼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《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》所強調之學生能動性



(student agency) (OECD, 2019)，在多元情境中進行判斷與選擇、承擔行動責任，以及在規範與自主之間進行調適之能力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，2021），同時體現「調和張力與兩難（reconciling tensions and dilemmas）」之精神。由此可見，手機治理不僅是行為管理，更是培養學生自律能力與數位素養的重要歷程。

四、結語與反思

在數位科技融入學習的時代，校園手機治理已不僅是紀律問題，而是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重大課題。為此，手機治理應由「控制導向」轉向「支持導向」，並從制度、班級與教師三個層面建構整體系統：制度提供明確權責與行政支持，班級透過參與與關係建立促進規範內化，教師則在專業信念與判斷中發揮引導作用，三者連動形塑學生由外在規範走向內在自律的學習歷程。

然而，任何規範若僅停留於學期初的一次性宣示，往往難以持續發揮教育影響力。因此，有必要進一步建構後續追蹤與評估機制，例如透過班

會分析手機違規紀錄之趨勢，以及教師的持續觀察與回饋，動態檢視規範實施成效。透過此一循環性的檢核與調整歷程，方能使手機治理由靜態規範轉化為持續運作的學習機制，進一步強化「自律引導」的長期效果。

手機治理的核心，不在限制使用，而在培養學生於使用情境中作出適切選擇的能力。當制度提供支持、教師有效引導、班級形成文化，並輔以持續性評估與回饋機制時，手機將由被管理的工具轉化為自律與深化學習的契機，進而實現由「管制」走向「共好」的教育目標。✎

參考文獻

-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、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、課程與教學研究所、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、中國教育學會（2021）。《預見教育 2030：風險時代的教育價值、反思與行動》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。
- Fullan, M. (2007). *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* (4th ed.). Teachers College Press.
- OECD. (2019). *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: OECD learning compass 2030*. OECD Publishing. <https://www.oecd.org/education/2030-project/>